



荆楚文库

楚器名物研究

黄凤春 黄婧 著

荆楚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北教育出版社



荆楚文库

楚器名物研究

黄凤春 黄婧 著

荆楚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
湖北教育出版社

荆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荆楚文库

楚器名物研究

CHUQI MINGWU YANJI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楚器名物研究/ 黄凤春, 黄婧著.

—武汉 :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5564-2641-6

I. ①楚…

II. ①黄… ②黄…

III. ①古器物—研究—中国—楚国 (?—前233)

IV. ①K87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47989 号

责任编辑: 刘 宁 朱思思

整体设计: 范汉成 曾显惠 思 蒙

美术编辑: 牛 红 张岑玥

责任校对: 刘慧芳

责任督印: 李 枫 张遇春

出版发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 (中国·武汉)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政编码: 430070

录排: 武汉伟创伟业广告有限公司

印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18

字数: 250千字

版次: 2019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 86.00元

ISBN 978-7-5564-2641-6



《荆楚文库》工作委员会

主 任：蒋超良

第一副主任：王晓东

副 主 任：王艳玲 梁伟年 尹汉宁 郭生练

成 员：韩 进 杨邦国 刘仲初 喻立平 龙正才

雷文洁 张良成 黄晓玫 尚 钢 黄国雄

陈义国 吴凤端

办公室

主 任：张良成

副 主 任：胡 伟 马 莉 陈 明 李耀华 周百义

《荆楚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

顾 问：罗清泉

主 任：蒋超良

第一副主任：王晓东

副 主 任：王艳玲 梁伟年 尹汉宁 郭生练

总 编 辑：章开沅 冯天瑜

副 总 编 辑：熊召政 张良成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朱 英 刘玉堂 汤旭岩

阳海清 邱久钦 何晓明 陈 伟 陈 锋

张建民 周百义 周国林 周积明 宗福邦

赵德馨 郭齐勇 彭南生

《荆楚文库》编辑部

主 任：周百义

副 主 任：周凤荣 胡 磊 冯芳华 周国林

成 员：李尔钢 邹华清 蔡夏初 邹典佐 梁莹雪

黄晓燕 朱金波

美 术 总 监：王开元

出版说明

湖北乃九省通衢，北学南学交会融通之地，文明昌盛，历代文献丰厚。守望传统，编纂荆楚文献，湖北渊源有自。清同治年间设立官书局，以整理乡邦文献为旨趣。光绪年间张之洞督鄂后，以崇文书局推进典籍集成，湖北乡贤身体力行之，编纂《湖北文征》，集元明清三代湖北先哲遗作，收两千七百余作者文八千余篇，洋洋六百万言。卢氏兄弟辑录湖北先贤之作而成《湖北先正遗书》。至当代，武汉多所大学、图书馆在乡邦典籍整理方面亦多所用力。为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湖北省委、省政府决定编纂大型历史文献丛书《荆楚文库》。

《荆楚文库》以“抢救、保护、整理、出版”湖北文献为宗旨，分三编集藏。

甲、文献编。收录历代鄂籍人士著述，长期寓居湖北人士著述，省外人士探究湖北著述。包括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民间文献。

乙、方志编。收录历代省志、府县志等。

丙、研究编。收录今人研究评述荆楚人物、史地、风物的学术著作和工具书及图册。

文献编、方志编录籍以 1949 年为下限。

研究编简体横排，文献编繁体横排，方志编影印或点校出版。

《荆楚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

2015 年 11 月

前言

“名物”一词见之传世文献，其义项较多，主要是指事物的名称、特征等。《周礼·天官·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贾公彦疏：“此禽兽等皆有名号物色，故云‘辨其名物’。”我们常说的“名物”是指与人类相关的各种器用与物品。中国历朝历代的传世文献极其丰富，特别是先秦的一些文献，如《诗经》《楚辞》《左传》等，其间可遍见有关起居、服饰等的各种名词，但由于年湮代远，有些已不尽为人所知了。诚如清人纳兰成德在《毛诗名物解·序》中所言：“六经名物之多，无异于诗者，自天文地理、宫室器用，山川草木，鸟兽虫鱼，靡一不具，学者非多识博闻，则无以通诗人之旨意，而得其比兴之所在。”

对“名物”的研究，早就引起了古人的重视，中国古代的传世文献《尔雅》首发其端，《说文》中也有较多考释。由于时代的不断演进，后代对于前代留下的一些文献大多不明其意了，于是就有“注”和“疏”出现。到了宋代，随着金石学产生，人们开始对一些古代礼书中器名进行研究，我们今天在博物馆中所见到的一些古代器名，诸如“鼎”“罍”“爵”“觚”等名称大都是沿用宋人的定名。但是，宋人的一些定名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当我将其考释的一些器名与出土文物上的一些器名相对比时也发现时有不类之处。好在一些出土的器物上大多有器物的自名，根据器物的命名原则，一般应以器物自名为准。只有辨清了器物在当时叫什么，以及它的用途，或者与古代礼制的关系等问题，才能更确切地知道它们的使用情况及演变情况，从而更进一步地领会传世文献所表述的要旨。

由于古代特别是商周时期，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侯国林立，再加上文字异形，言语异声，开展对上古名物的研究是一项系统而庞大的工程。

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南方的一个诸侯国，由西周时的一个“土不过同”（《左传·昭公二十四年》）的蕞尔小邦，发展到战国时期的“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战国策·楚策》）的泱泱大国，曾创造丰富灿烂的物质文化。在传世文献中也保留了较多的有关楚人名物的资料，如《楚辞》一书就不仅记录有丰富的名物资料，还有对某些物品制作和使用记录，是我们研究楚国名物的重要资料。特别值得提到的是，随着大量的楚墓、楚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各类不同质地的楚遗物也得以面世，大量楚简牍和楚金文材料的发现，特别是出土了多批直接记录楚器物的“遣策”简，为研究楚名物提供了诸多可供对比的材料。

对于楚名物的研究，尽管今人有了比前人更多的研究资料，但一直以来却很少有人作系统的研究，更没有一个可供借鉴的范本。具体到楚物而言，可以说是林林总总，要想全面尽括其中，也不太现实。于是我们在对象的选择上只是提及常见于文献中一些事与物，同时也避开了古代一器多用，一器多名的烦琐考证。

笔者对于楚名物的研究兴趣应当说由来已久，20世纪80年代，我曾专门和我的老师——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国历史与文化研究所原所长郭德维先生谈到研究楚器名物的想法，先生非常支持和认同。随后，我与先生合作写了一篇《楚辞名物新证》，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基于楚人对各类人工制品的制作、使用、称谓及演变等，发表于《楚文艺论集》第二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开启了我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研究楚名物的初衷，一是考察传世文献所常见的与楚人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等事与物；二是从文献与考古发掘出土实物的对比出发，考证器物的形制和源流。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并不是一部偏重于考释性的著作，而更主要是普及相关知识，所以，引用相关文献时均进行了意译，以期能尽量以大众所能理解的语言来表达观点。

由于笔者水平所限，再加上时间紧迫，特别是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并不全面，所书结果可能与初衷相距甚远，还望读者见谅。

黄凤春

2018年8月谨记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服饰篇	5
第一节 导论	5
第二节 头衣	14
第三节 上衣与下裳	25
第四节 手衣与足衣	42
第五节 寝衣	47
第六节 兵服与丧服	49
第二章 佩饰篇	54
第一节 导论	54
第二节 领饰和蔽膝	55
第三节 带和带钩	56
第四节 单佩和组佩	61
第五节 囊与佩芳	68
第六节 容刀与佩剑	69
第七节 发式与发饰	73
第三章 饮食篇	81
第一节 导论	81
第二节 饮食器具	99
第三节 其他	110
第四章 出行篇	117
第一节 导论	117
第二节 代步工具——肩舆（轿）	119

第三节 车马	123
第四节 舟楫	143
第五节 楚国的交通	147
第五章 建筑篇	151
第一节 导论	151
第二节 建筑材料	163
第三节 建筑技术	167
第四节 室外装饰	168
第五节 室内装潢	170
第六节 室内陈设	172
第六章 墓葬礼俗名物篇	175
第一节 导论	175
第二节 椁外铜戈与《周礼》中的“戈击方良”	183
第三节 凤鸟双联杯与《仪礼》中的三醕合卺	187
第四节 毁器与折兵	193
第七章 考论篇	205
第一节 导论	205
第二节 铜方豆与宥坐之器	205
第三节 湖北郢县新出唐国铜器铭文考释	212
第四节 新见楚器铭文中的“竞之定”及相关问题	223
第五节 释信阳楚简中的“碯石之碯”	234
第六节 秭归庙坪及巫山双堰塘陶鬲的年代与文化属性	244
第七节 郢县辽瓦店子与楚句亶王	255
第八节 包山 2 号楚墓饰棺连璧制度补证	265
参考文献	274
后 记	281

前言

“名物”一词见之传世文献，其义项较多，主要是指事物的名称、特征等。《周礼·天官·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贾公彦疏：“此禽兽等皆有名号物色，故云‘辨其名物’。”我们常说的“名物”是指与人类相关的各种器用与物品。中国历朝历代的传世文献极其丰富，特别是先秦的一些文献，如《诗经》《楚辞》《左传》等，其间可遍见有关起居、服饰等的各种名词，但由于年湮代远，有些已不尽为人所知了。诚如清人纳兰成德在《毛诗名物解·序》中所言：“六经名物之多，无异于诗者，自天文地理、宫室器用，山川草木，鸟兽虫鱼，靡一不具，学者非多识博闻，则无以通诗人之旨意，而得其比兴之所在。”

对“名物”的研究，早就引起了古人的重视，中国古代的传世文献《尔雅》首发其端，《说文》中也有较多考释。由于时代的不断演进，后代对于前代留下的一些文献大多不明其意了，于是就有“注”和“疏”出现。到了宋代，随着金石学产生，人们开始对一些古代礼书中器名进行研究，我们今天在博物馆中所见到的一些古代器名，诸如“鼎”“罍”“爵”“觚”等名称大都是沿用宋人的定名。但是，宋人的一些定名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当我将其考释的一些器名与出土文物上的一些器名相对比时也发现时有不类之处。好在一些出土的器物上大多有器物的自名，根据器物的命名原则，一般应以器物自名为准。只有辨清了器物在当时叫什么，以及它的用途，或者与古代礼制的关系等问题，才能更确切地知道它们的使用情况及演变情况，从而更进一步地领会传世文献所表述的要旨。

由于古代特别是商周时期，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侯国林立，再加上文字异形，言语异声，开展对上古名物的研究是一项系统而庞大的工程。

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南方的一个诸侯国，由西周时的一个“土不过同”（《左传·昭公二十四年》）的蕞尔小邦，发展到战国时期的“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战国策·楚策》）的泱泱大国，曾创造丰富灿烂的物质文化。在传世文献中也保留了较多的有关楚人名物的资料，如《楚辞》一书就不仅记录有丰富的名物资料，还有对某些物品制作和使用记录，是我们研究楚国名物的重要资料。特别值得提到的是，随着大量的楚墓、楚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各类不同质地的楚遗物也得以面世，大量楚简牍和楚金文材料的发现，特别是出土了多批直接记录楚器物的“遣策”简，为研究楚名物提供了诸多可供对比的材料。

对于楚名物的研究，尽管今人有了比前人更多的研究资料，但一直以来却很少有人作系统的研究，更没有一个可供借鉴的范本。具体到楚物而言，可以说是林林总总，要想全面尽括其中，也不太现实。于是我们在对象的选择上只是提及常见于文献中一些事与物，同时也避开了古代一器多用，一器多名的烦琐考证。

笔者对于楚名物的研究兴趣应当说由来已久，20世纪80年代，我曾专门和我的老师——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国历史与文化研究所原所长郭德维先生谈到研究楚器名物的想法，先生非常支持和认同。随后，我与先生合作写了一篇《楚辞名物新证》，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基于楚人对各类人工制品的制作、使用、称谓及演变等，发表于《楚文艺论集》第二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开启了我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研究楚名物的初衷，一是考察传世文献所常见的与楚人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等事与物；二是从文献与考古发掘出土实物的对比出发，考证器物的形制和源流。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并不是一部偏重于考释性的著作，而更主要是普及相关知识，所以，引用相关文献时均进行了意译，以期能尽量以大众所能理解的语言来表达观点。

由于笔者水平所限，再加上时间紧迫，特别是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并不全面，所书结果可能与初衷相距甚远，还望读者见谅。

黄凤春

2018年8月谨记

第一章 服饰篇

第一节 导论

衣服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出现，并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演化。原始社会初期，人类在与自然的抗争中，必然要遇到春暖、夏热、秋凉、冬寒的季节更迭，为了适应生存，人类首先解决的就应是适应气候变化的问题。根据民族学资料，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时代，人们往往将比较容易得到的树叶用植物的茎藤捆扎在身上，这便是人类最早的服装。在长期的狩猎和采集中，人类又逐渐领悟出兽皮不仅比树叶更能抵御寒风，还可根据人体的形状将其分割成若干条块制成适体的衣服。这是一个长期探索的结果，也可以说是人类对衣着美追求的一个转折。考古资料表明，在距今 18 000 年的山顶洞人的居址中发现了磨制的骨针，其上还有针眼，显然是用来缝制衣服的。

进入新石器时代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活动量的增多加速了人类对衣着的改进，开创了我国服装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时代。考古资料表明，无论是在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纺织用的工具和用于缝制衣服的骨针，一些遗址中还发现了纺织品的印痕，说明当时的人类已能够运用天然的植物纤维纺织成布。从新石器时代出土的彩陶图像和玉雕像上看，当时的人们已普遍穿有衣服。

商和西周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发展的时代。从社会生产力看，青铜冶炼业的出现和发展，客观上推动了其他行业包括纺织业的发展，纺织业的发展又促使人们对衣服和佩饰更加讲究。从社会结构看，产生了不同

的社会阶层，贫富分化加剧，统治阶层不仅掌握着国家的权力机构，还大量聚奇敛财。反映在服饰上的就是贵族阶层不仅追逐高贵的衣料和华丽的装饰，还给服饰赋予一种神秘的色彩。这就是通过穿着衣服的款式、色彩、花纹来体现贵贱等级的差别，并将其纳入礼制的范畴。

商和西周的服饰迄今尚无实物面世，但通过考古发掘的一些铜铸、玉雕和石雕的人物图像也可以略见端倪。从整体而论，商周时所流行的服饰大多为上衣与下裳相连的左衽服式，同时还有对襟之衣。可以说，上衣与下裳相连的服式已是此时人们装束的定制，成为引领中国后世服装发展的主流。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服饰是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因为受不同时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制约，再加上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导致生活习惯的差异，从而形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服饰世界。如果说服饰的发展史也是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服饰则是人类社会风俗、时尚和信仰的重要载体。换言之，人类的服饰可折射出人类文明的诸多内涵。

东周时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大变革时期，诸国林立并未阻隔人类文化的交融，兵戎交加也没有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反的是，伴随着诸国畛域的此消彼长，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仅楚国而言，在西周之世还是一个“土不过同”的蕞尔小邦，进入战国后已是一个“带甲百万，地方五千里”的泱泱大国了。也正是这样一个以蛮夷自居的楚国在纵横捭阖的征战中，以自身特有的传统文化向外辐射，所及之处，兼容并蓄，最终形成了独具风貌的楚文化。所谓独具风貌就是有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一种群体文化，恰似闻其音而知其域，观其形而明其国。仅服饰而言，楚文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左传·成公九年》就记有这样一个故事，晋侯在军府见到了被郑人所俘的楚国人钟仪，便问有司，被捆绑着的戴着南冠的人是谁，当获知是楚国的钟仪时，就派人为其松绑，召而相见。这里所说的“南冠”就是楚人不同于中原人的一种特有的冠式。晋侯一望冠就知道戴冠者是异国人。楚人的装束的确不同于中

原，在文献中曾多以“楚服”和“楚制”相称。《史记·叔孙通传》载，当叔孙通身着儒服时，深受汉王刘邦的厌憎，当他改穿楚服后，汉王则由憎变喜。这一憎一喜，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古人喜爱本民族服装的审美心态，这一记载虽发生在楚裔的汉人中，但由此可知，具有浓郁楚风的楚服饰仍为后人所敬慕，可见其流风之深，遗泽之广。然而记载毕竟归记载，它还不足以完整地体现楚服的全貌，当我们把目光凝聚在每一件楚服时，才能真正全面深刻地领悟浓郁楚风中的奇特与诡谲。

一、楚国的纺织和织品

要了解楚人的服饰，必须先知晓楚人的纺织和织品，可以说没有纺织和织品，就没有色彩斑斓、形式异趣的楚服饰。

楚人的纺织技术在经历了新石器、夏和商几世的发展，到东周后已跃居列国之首了。不过西周时期，楚国的纺织业还不足为道。《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时令尹子革的话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筮路蓝缕以处草莽”，就是说楚国的始封君熊绎在创业之初坐的是柴车，穿的是破烂的衣衫。这里尽管对楚先王的衣着有言过其实之处，但也可想见立国之初的楚国纺织业还处于草创阶段。

春秋时楚国的纺织业已得到迅猛的发展，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方面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种植业和养蚕业，另一方面广泛吸取他国的经验和人才。这样不仅为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还引进了大量娴熟的从事纺织技术的人才。

《史记·楚世家》载楚平王十年（前519），楚国的边邑钟离（今安徽凤阳县东北）与吴国的边邑卑梁（今安徽天长县西北）相邻，两国的边民因“小童争桑”而引发了一场楚灭卑梁、吴灭钟离的吴楚边境之战。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成语“卑梁之衅”的来源。由两国边民的小孩争采桑叶而爆发两国间的战争，这在先秦的战例中极其罕见。由此可见，楚吴两国都极其重视种桑和养蚕业。

楚人在对外的扩张中，似乎也在不遗余力地谋求发展本国的纺织